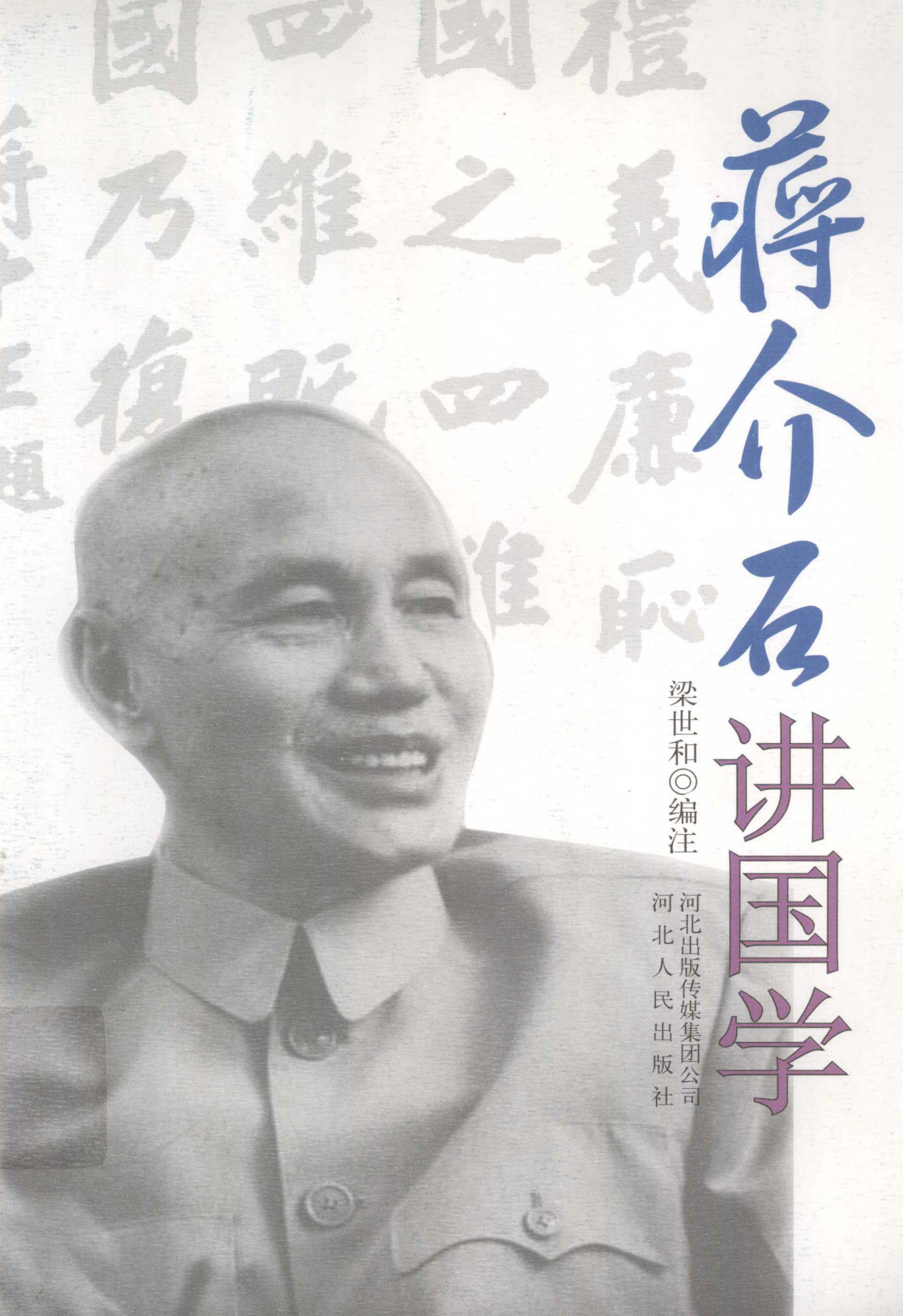


蒋介石讲国学

梁世和◎编注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人民出版社



梁世和◎编注

蒋介石讲国学

中和位育 乾陽坤陰
至誠無息 主敬立極
天地合德 克念作聖
日月光明 中正
符中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讲国学/梁世和编注.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202 - 05730 - 8

I. ①蒋… II. ①梁… III. ①国学-研究-中国
IV. ①Z126.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1688号

书 名 蒋介石讲国学

编 注 梁世和

责任编辑 李世琦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9

字 数 485 000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202 - 05730 - 8/B · 201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 选 说 明

1. 本书所选蒋介石文字全部出自秦孝仪主编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全四十卷），该书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中华民国七十三年（1984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部分内容参校蒋介石文集的单行本。

2. 很多人以为蒋介石乃一介武夫，不通文墨，其实这只是一种想当然的、以讹传讹的说法，又有论者指出蒋介石的许多文字乃他人代笔，非蒋本人所能为，如李敖就说：“所谓蒋介石‘可以说是著述等身’，其实都是他的文学侍从们捉刀的。”这也是一种片面的说法，实际上，蒋介石对自己的文字功底非常自信，不仅喜欢改他人文稿，还经常为人代笔。流传甚广的陶希圣代笔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据学者研究指出，陶希圣只负责了《中国之命运》原稿的整理、校订，及排印、校对工作，只属于辅助性质。通观蒋介石的著述，可以说是代表了他的思想的。《蒋介石讲国学》一书选录演讲文字颇多，可谓名副其实的“讲国学”，而演讲形式的个性化特点，可以更加体现蒋氏个人的国

学体悟和修为。

3. 本书依照国学门类，及蒋介石相关论述，共分为：讲《大学》《中庸》、讲哲学、讲兵学、讲民族精神与民族道德、讲经世之学、讲国学书目与治学方法、教儿孙学国学七个部分。

4. 由于时代等诸多原因，蒋介石的文字用法和标点习惯与今天存在一定差异，如蒋介石原稿中，常以“的”代“地”、“那”代“哪”、“沈”代“沉”、“作”代“做”、“仿”代“仿”、“纪”代“记”等。编校中尽量保持原貌，对在阅读中不致发生歧异的用字和标点不予改动；由于版本差异，或蒋氏个人不同时期文字习惯差异，蒋氏引用古籍的标点断句略有不同，对于不影响文意理解之处，为尽量保持原貌，未做统一处理。

5. 对文中涉及政治辱骂的个别字句，如“共匪”等进行了删除。由于本书以讲国学为内容，删去个别意识形态对立的字句，完全不影响对文章的理解。

6. 由于蒋介石著述极多，仅《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就已卷帙浩繁，因此《蒋介石讲国学》的编选难免疏漏，未必能完全代表蒋氏的国学思想，唯冀读者不吝赐教，以待日后补充完善。

目 录

编选说明	(1)
导言 蒋介石与国学	(1)
第一编 《科学的学庸》	
——蒋介石讲《大学》《中庸》	(13)
大学之道 上篇	(13)
大学之道 下篇	(33)
附录一 大学章句	(44)
附录二 大学古本	(53)
附录三 王阳明《大学问》	(56)
附录四 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	(61)
中庸要旨	(64)
附录一 自勉四箴	(84)
附录二 中庸章句	(86)
政治的道理	(105)
第二编 蒋介石讲哲学	(119)
一、哲学与人类、国家、民族之关系	(119)
二、中国哲学之精神	(132)
三、“知难行易”与“知行合一”哲学的精义	(174)
四、力行哲学要义	(190)
第三编 蒋介石讲兵学	(204)
一、战争哲学的核心问题	(204)
二、军人之精神与修养	(211)
三、中国历代军人道德典范	(245)
四、讲解《孙子兵法》	(253)

五、讲解曾国藩《得胜歌》	(265)
六、讲解《戚继光语录》	(273)
第四编 蒋介石讲民族精神与民族道德	(282)
一、民族精神、民族道德与民族复兴	(282)
二、四维八德——民族固有美德的统摄	(304)
三、做人的十二条守则要义	(314)
四、国民教育问题	(325)
第五编 蒋介石讲经世之学	(340)
一、中国传统经济学说	(340)
二、读史以鉴今	(353)
三、人才战略	(380)
第六编 蒋介石讲国学书目与治学方法	(391)
一、蒋介石推荐的国学书目	(391)
二、读书与治学之方法	(430)
第七编 蒋介石《家谕》	
——教儿孙学国学	(435)

导言 蒋介石与国学

梁世和

一

蒋介石一生受国学影响极深，仅其姓名就典出多处。蒋介石原名蒋瑞元，族谱名蒋周泰，十六岁时改名蒋志清，后受所习国学的熏染，才改为名中正，字介石，并成为他一直沿用的名字。其名和字是在日本期间取的，他在日本高田野炮兵联队期间的一张照片上题有“中正”二字，当是他采用此名的开始，后渐以“中正”为名^①。“蒋介石”是他1912年在日本时创办《军声》杂志中使用的笔名，后便以“介石”为字。他的名和字用典均出自《周易·豫卦》，豫卦卦辞说：“利建侯，行师。”意为占得此卦，即会有利于封侯建国、行师出兵，这与蒋介石志向完全相符。他在民国前三年留学日本题赠表兄单维则的一张照片背面题诗曰：“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尽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②因此，取名于豫卦，寄托了他兴师讨伐、光复神州的志向。其次，豫卦六二爻辞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这是他名字的原典出处，但对这句爻辞及象传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蒋介石的解读则是来源于朱熹。朱熹《周易本义》解释说：“豫虽主乐，然易以溺人。溺则反而忧矣。卦独

① 据李勇、张仲田编著的《蒋介石年谱》称，蒋介石在1918年，即31岁时，才起名“中正”，以后在正式场合一直使用此名。见李勇、张仲田编著：《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② 蒋介石：《文录》，《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五），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年版，第293页。

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独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静而坚确，故其思虑明审，不俟终日，而见凡事之几微也。”意思是说，豫是欢乐之义，但欢乐容易使人沉溺其中，反而让人忧虑。豫卦只有六二爻是得正居中，因其阴爻居阴位。上下各爻都沉溺于欢乐，独此爻能保持警觉，以中正自守，其狷介、孤高如岩石一般。正因为这样的德性，所以才能慎思明审，不用整日，就能洞察事情的微小变化，看破吉凶，以其中正，因而吉祥。朱熹所谓“中正自守，其介如石”，显然就是蒋介石取名“中正”与“介石”的寓意。蒋介石留有“其介如石”的题词，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中正”一词也见于《中庸》，其中有曰：“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意思是说，庄重端正，足以使人尊敬。《中庸》是蒋介石极为偏爱的儒家经典，他解释说：“这中庸之‘中’，乃是‘大中至正’‘中立不倚’‘屹立不摇’之谓，亦即所谓‘主敬立极’，所谓‘择善固执’，所谓‘允执厥中’之意。”^①而其中“大中至正”一词，又是出自蒋介石最为敬佩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传习录》^②。所以，“中正”一名至少典出三处，蒋介石非常喜爱“中正”一词，因此“蒋中正”成为他最正式的称呼，台湾地区多沿用此称呼，而大陆多以“蒋介石”呼之。

蒋介石九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王太夫人虽命运多舛，却在逆境中养成了坚强意志，力图振兴家声，她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因此对蒋介石督教甚严。蒋介石生性活泼好动，顽皮不驯，其年谱记载说“王太夫人忧之，故未五岁，即送入塾读书”^③。在母亲的督导下，蒋介石读了不少传统经典。最初的启蒙读物是《神童诗》等，他对此书非常喜好，甚至把少年时期读过的《神童诗》带到了台湾，并赠送给高中毕业的长孙蒋孝文作为纪念。^④蒋介石七岁时读毕《大学》《中庸》，八岁时读完《论语》《孟子》《礼记》，十四岁以前学完《孝经》《春秋左传》《唐诗》《诗经》《尚书》《易经》，其间又兼习古文辞，学作策论，十五岁从毛思诚受教温习《左传》，圈点《纲鉴》，十六岁入凤麓学堂，受新式教育，而学校课目仍以经史为主，十七岁时又转入宁波箭金学堂从

① 蒋介石：《科学的学庸》，《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六），第80页。

② 王守仁《传习录》上卷，曰：“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③ 《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④ 参见《蒋介石的〈神童诗〉52年后回故乡》，《作家文摘》，2002年第23期。蒋介石在扉页题词：“此书为我少年诵读之书，孝文大孙品读珍藏。四十四年七月八日于角板山。”这说明蒋介石保存此书至少有六十年以上。

顾清廉学习，顾清廉除为其讲解经学之外，还传授周秦诸子、《说文解字》《孙子兵法》《曾文正集》，以及性理之学。^① 蒋介石对《孙子兵法》与曾国藩表现了浓厚兴趣。顾清廉对青年蒋介石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其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蒋介石曾满怀感激地说：“吾国载籍之繁富，学术渊源之广远，略涉其涯涘，以及通晓读书法，窥见汉文门径，皆顾先生一手陶成之。”^② 顾清廉还讲述了孙中山在国外的革命情形，并鼓励青年出洋留学，获取新知识。这使蒋介石颇受启发，充满了向往，其后不久便赴日本学习军事。

在日的留学经历，不仅没有降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他对中国哲学的信念。究竟是什么经历对他产生这样的影响呢？他回忆说：“当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在轮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传习录》，且有很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这个哲学的精义；特别是他陆海军官，对于阳明哲学，更是手不释卷的在那里拳拳服膺。后来到书坊去买书，发现关于王阳明哲学一类的书籍很多，有些还是我们国内所见不到的，我于是将阳明哲学有关的各种书籍，尽我所有的财力都买了来，不断的阅读研究，到了后来对于这个哲学真是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种心领神驰的仰慕，乃知日本以蕞尔小国，竟能强大至此实得力于阳明‘致良知’‘即知即行’哲学的结果。”^③ 后来蒋介石又多次慨叹中国的王阳明哲学使日本得以强大，而中国人自己却不予重视，反被人家拿来欺侮中国。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国的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反给日本人窃去，

① 此处蒋介石的年龄以周岁计算。参见《先总统蒋公大事年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年版；万仁元等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李勇等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② 《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③ 蒋介石：《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三），第339—340页。

拿来压迫中国，还要来灭亡中国，这是多么可耻可痛的事情！”^①这样的历史事实深深刺痛了蒋介石，也坚定了他对民族固有文化的信念，促使他后来成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民族复兴，必从民族文化复兴开始。“我们今日如能从自己固有的哲学基本上做起，而再以科学的方法与觉悟，急起直追，则对他不只可以迎头赶上，而且必可后来居上。”^②

蒋介石虽自小就接受国学传统教育，但他完全建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并使其消化吸收为自身思想的一部分，却经历了一系列反复琢磨体会研究的过程。蒋介石以《大学》和《中庸》为其国学思想的本原，专门著有《科学的学庸》一书，对《大学》和《中庸》思想进行阐发，并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三次订正，可见其对此书的重视，但他并非一开始就认识到《大学》《中庸》的价值，他回忆说：“我回想以前幼年时候，先生教我读《大学》《中庸》，不知道背诵过多少遍，我到十八岁的时候，在箭金学堂，顾葆性先生从新要我再读这一本《大学》，当我读到这两句话，看到‘天子’两个字，乃认为《大学》一书，不过是讲论帝王，和如何统治天下那一套腐朽的空论，觉得很讨厌，便从此丢弃，不愿再读了，一直搁了十年。”^③“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总理对我讲《大学》之道，才知道这部书是一部最有价值的政治哲学，将它彻底研究之后，我更体会到这部《大学》，乃是一部最有价值的军事哲学。后来再不断研究，就觉得其中每一句话，都有其深切的道理。”^④孙中山的话起了一定作用，但蒋介石当时对《大学》的信心并不坚定。后来他又说：“我从前在二十岁的时候，虽然读得烂熟，但是毫无兴趣。后来总理教我看，也还是不觉得重要。后来到三十几岁的时候，自己再拿来研究，才觉得很有道理，很有兴趣。”^⑤再后来又说：“但是这种古书（指《四书五经》），不到相当的年龄，有相当的经验程度，必不能感到它的真有价值，尤其不知道它对于我们的国家，以及对于我们个人德业的重要。我现在已经四十六岁了，我在五、六年前，即四十岁以

① 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第534—535页。

② 蒋介石：《十九世纪以来亚洲的形势和我们复国建国的要道（下）》，《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九），第125页。

③ 蒋介石：《科学的学庸》，《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六），第21页。

④ 同上书，第38页。

⑤ 蒋介石：《御侮与复兴之基本要道》，《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四），第24页。

后，才晓得经书对于我们革命和国家的重要。”^① 蒋介石于何时确立了对《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价值的坚定信念，他在不同时间、地点的讲法是不同的，一说二十八岁，一说三十几岁，一说四十岁以后。不同的说法看似矛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随着年龄、经验增长，越来越认识到儒家经典的价值和魅力。直到他八十一岁时，仍称“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②；八十四岁时，还为六十一岁的蒋经国讲解《大学》和《中庸》^③；八十五岁时，声称自己过去十年来“对于我国中道哲学之研究，自觉有进一步之心得”^④。可见，蒋介石对国学的修习确确实实贯穿了他的一生。

二

国学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的分类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种是四库全书分类法，即把国学的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分。自汉代刘歆的《七略》之后，大都采用这种四部分类法，但这种分类法偏重于形式，不宜于表现实质内容。另外一种曾国藩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科分类法。这是曾国藩在姚鼐有关学问的义理、考据、词章三分法基础上，增加经济^⑤一科形成的，他把这四科与孔门四科联系衔接起来，即义理之学——孔门之德行科，词章之学——孔门之语言科，经济之学——孔门之政事科，考据之学——孔门之文学科，增强了说服力。曾国藩的分类法自成一家，成为国学分类法中的重要一种。义理之学的主要内容包括：经学（如周易学、尚书学、诗经学、三礼学、春秋三传学、论语学、孝经学等）、子学（如儒家诸子学、道家诸子学、法家诸子学、墨家子学、阴阳家子学、杂家诸子学等）、玄学（附道教思想）、佛学（如唯识学、三论学、净土学、密学、禅学、法华学、华严学等）、理学（如濂学、洛学、关学、闽学、象山学、阳明学等）、新哲学等；词章之学的主要内容包括：文学（如文章学、文法学、修辞学、诗学、词学、散曲学、戏剧学、小说学、文学批评学等）、艺术（如音乐学、舞蹈学、绘画学、雕刻学、建筑学、刺绣学等）；考

① 蒋介石：《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一），第12页。

② 蒋介石：《文录》，《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五），第330页。

③ 蒋经国：《十年风木》，实践出版社，1985年，第103—104页。

④ 蒋介石：《文录》，《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五），第333页。

⑤ 曾国藩所谓的经济之学，即经世之学，比今天意义上的经济学的内容要宽泛得多。

据之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考文字之学（如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考文籍之学（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考文物之学（如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简牍学、缁帛学、敦煌学、库档学等）；经济之学（经世之学）的具体内容包括：自然科学（如天文学、地理学、历算学、博物学等）、社会科学（如史学、兵学、政学、纵横学、食货学、教育学、礼俗学、财用学等）、应用科学（如农桑学、水力学、工艺学、医药学等），以及术数学等^①。以这样一种分类法来考察蒋介石的国学思想内涵，则他所涉及的国学门类，主要集中在义理之学与经世之学。此外，他在词章之学中的文章与书法艺术上也有一定的造诣。

在中国传统学术上，义理之学的地位最高，在四科之中处于核心地位，统领并会通其他三科。曾国藩明确指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②，“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苟通于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③。从传统的体用关系来说，义理之学为体，经世之学为用；从“学”与“术”的角度来看，义理之学是“学”，经世之学是“术”；从修己治人的内圣外王角度来说，义理之学为内圣之学，经世之学为外王之学。蒋介石说：“我们中国的学者，把道德范围的内治工夫，叫做‘性命之学’，把智识范围的外修工夫叫做‘经世之学’，而以两者的均衡和统一，即‘合外内之道’为学问的最高标准，也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境界。”^④ 蒋介石这里把义理之学称为“性命之学”和“内治工夫”，把经世之学称为“外修工夫”，并把“合外内之道”作为学问的最高标准。蒋介石的这种认识确实把握了中国学术的精髓，他以此为目标身体力行，力图在自己的治学上做到体用兼备、学以致用。

蒋介石在义理之学上所涉及的主要是经学、子学、理学和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等门类。义理之学是蒋介石思想中的核心部分，他把义理思想贯穿到他经世之学的方方面面，成为其他一切思想的根源和统领。蒋介石对哲学^⑤异乎寻常的重视。他说：“一国哲学之盛衰，简直是关系于

① 参见高明《国学研究法》，《国学研究论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34页。杜松柏《国学治学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7页。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5页。

③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3页。

④ 蒋介石：《为何汉奸必亡侵略必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五），第214页。

⑤ 广义的哲学概念与义理之学基本上可以等同，蒋的哲学就是义理之学。

其国家之兴亡与民族之消长，我们现在要求国家独立与民族复兴，必要使哲学先能复兴和独立起来，否则，无论你国家怎样强大，都要归于失败。”^① 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上对学术思想的重视是完全一致的。清初三大学之一的孙奇逢就指出：“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② 学术是世运的象征，学术兴则世运盛，学术废则世运衰。蒋介石的看法与孙奇逢如出一辙，其前半句简直就是孙奇逢意思的白话版。梁启超也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观其国文野强弱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③ 梁启超认为国家之有学术思想，犹如人之有精神，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明开化及强弱程度。蒋介石对哲学的态度与孙奇逢、梁启超显然一脉相承。他在义理之学方面的建树，统而言之，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承继中华文化道统，二是赓续儒家重行哲学学统。

一般认为唐代韩愈明确提出了道统之说。韩愈在《原道》中对于道统的内容、功能及相传的系统都进行了说明，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这一传道系统。宋代朱熹进一步将韩愈儒家传授系统的思想概括为“道统”，并把这一道统向上推衍，把伏羲列为首位。其弟子李元纲勾画出一幅“道统相传图”，称由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与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一系构成，从而使中国道统相继不绝。至此，这一道统说被后世儒家学者普遍认同。孙中山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④ 蒋介石自称追随国父孙中山之后，嬗接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道统。他对中华道统推崇备至，说：“中国道统哲学之伟大，不仅人已不分，而且是心物一体，内外一贯的，今日之物理与科学，研究发展的由来，皆不能超越他这一个学说。”^⑤

道统既要明道之统续，又要明所传之“道”。朱熹在《中庸章句

① 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八），第267页。

② 孙奇逢：《北学编序》，《夏峰先生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6页。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1页。

④ 孙中山：《与马林的谈话（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 蒋介石：《科学的学庸》，《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六），第36—37页。

序》中指出道统之“道”为尧传舜的“允执厥中”四字，及舜传禹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以后历代儒者视这十六字心传为道统的纲领。蒋介石对此阐发说：“尧以传之舜、舜以传之禹的中国历史一贯相传之‘道’，我以为这四语，实在就是中国道统所传授的心法中之要诀。乃可名之为‘道统四语诀’。……这‘道统四语诀’，乃亦为便于传授道统，并为免于后来失了其道统宗旨而作的。”蒋介石进而指出这“道统四语诀”之“道”的本质，乃在于“允执厥中”的“中”字，即指中庸之“中”而言，就修养工夫来说，乃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中”。他把这“道统四语诀”的内涵，总结为“危、微、精、一、中”五个字，认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与军事的哲理，就只在这五个字里面。此外，“道心”即“仁”，“精一”即“诚”。因此，十六字心传之“道”又包括了“仁”与“诚”。在此基础上，蒋介石又指出作为本体论的《中庸》，与作为方法论的《大学》，是中华民族四千年来古圣先贤递相传习的重要道统。

道统既明，蒋介石又从道统开出学统——创建自己的力行哲学体系，以赓续中国传统重“行”的实践哲学学统，这是他在义理之学方面的又一建树。中国传统思想中重“行”的传统由来已久，《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中庸》说：“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司马迁和《中庸》所引孔子的话，都说明了孔子对“行”之重视。因此，主张即知即行，强调实践为主的道德哲学体系，乃是中国哲学传统的精华。《尚书》有一句名言叫做“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其本意也是说要在行上落实，空言不如力行。孙中山认为，这种思想发展到后来已发生很大偏差，国人是“不知不去行，知之又不敢行”。既不重视理论的作用，又没有努力实践的勇气，因此本意是重行，却变成了怕行。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后代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只是在“知”的层面下功夫，“行”的实践却不被重视。明代王阳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知行合一”学说，强调“即知即行”以救其偏，还特别提出实现“知行合一”的方法，即“致良知”。“致”本身就是“兼知兼行”、“亦知亦行”的过程，“致良知”就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因此，注重“行”是王阳明哲学的精华所在，是对儒家道德实践哲学的重要贡献。孙中山针对时人对“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误解，重知而轻行，提出“知难行易”的学说，藉以消除人们对“行”的畏难与轻视心理。

蒋介石首先澄清人们对《尚书》“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误读，指出这句话的原意是说空言不如力行，是鼓励实行的意思，然后又说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的真正含义是鼓励人们去力行，继而又指出只有从力行中才能求得真知，唯有力行才没有所谓难事，之后又说明太极本体的运作是即物穷理，因而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即事即物，即知即行，接着分析中国过去失败的原因，乃是不去力行，而日本的强盛正在于对武士道和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实行。最后，蒋介石强调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在思想上是相通的、一贯的。他说：“总理所讲‘知难行易’的‘知’，同王阳明所讲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知’，……其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学’之意完全是一致的。”^①两种学说相通处的要点在于，都是要人去力行，正因为这两种学说都是以“力行”为目标的实践哲学体系，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可以用来辅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在此基础上，蒋介石提出“力行哲学”的思想体系，以阐明行的意义、行的目的、行的精神、行的法则、行的原动力、行的人生观、行的宇宙观等。

三

“力行哲学”要化为现实的力量，需通过具体的经世之学来实现。蒋介石在经世之学中的兵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礼俗学、史学等领域，都有着重要作为，而且重要的是在于他把义理之学的思想贯彻到经世之学之中，因此经世理念的达成，即是力行哲学的实现。从“道统”、“学统”和“政统”关系角度看，蒋介石从中国文化“道统”开出力行哲学“学统”，从而实现了“道统”、“学统”和“政统”的合一。蒋介石利用他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源来推行他的“力行哲学”，正因为如此，他对国学与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里仅以他在大陆和台湾所发动的两次传统文化复兴运动为例来说明。

首先是发生于1934年至1949年的“新生活运动”。因为这次运动是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所以命名为新生活运动。蒋介石亲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会长，统领全国各地新生活运动工作。新生活运动主张以中国固有道德“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从改造国民的

^① 蒋介石：《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三），第345页。

“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使国民改头换面，从根本上革除陋习，从而达到改革社会、振作国民道德精神、复兴国家和民族的目的。因此，新生活运动是一场以弘扬和实践传统伦理道德为核心的运动。蒋介石明确指出：“全国同胞须知这个新生活运动，实在的说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之所以可贵，所以高尚，为世界所称颂的，亦就在于一切食衣住行，皆能纳入于礼义廉耻的规范之中。”^①

新生活运动从日常生活入手，正是孔子所谓“下学而上达”之意，日常生活虽然只是“食衣住行”等“下学”之事，但古人认为“上达”即在“下学”之中。蒋介石所秉持的就是这样一种理念，他说：“中国哲学入门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国古时教人从洒扫应对进退教起，将我们固有一贯的哲学精神，从基本生活与行动方面来传授给青年，使他们即事即物，随时随地能得到深切的启示，养成良好的习性。这种基本的修养，就是哲学教育入手的方法，亦就是王塘南所说‘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者’。……大家不要以为这种日常食衣住行的动作与应对进退的礼节，是极粗浅琐屑的事情，用不着怎样注重，要知道我们日常的生活行动，就是我们每个人精神人格的表现，我们无论懂得怎样高深精微的哲学理论，如果不能建立我们的精神与人格，而使之从生活实践中表现出来，那就不能说我们已经懂得哲学，真正有了哲学的涵养。”^②因此，蒋介石所主导的新生活运动从细微处入手，确实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之效，可谓用心良苦。从对传统文化影响的角度看，新生活运动使传统道德渗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提高民众道德素质、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众团结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反思丢掉大陆的原因，认为思想、文化、教育的失败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最终导致了民族自信和精神丧失。因此，蒋介石到台湾后不久就把“保卫中国文化”作为工作重点之一，以恢复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台湾自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接受了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在日本占据时期，台湾限制使用中文，禁读中国历史，强迫推行日语。日本殖民文化对台湾

^①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九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二），第24页。

^② 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八），第274—275页。